

关于唐紹仪的生平及其与孙中山 袁世凱容閎的关系

黎 照 寰

《广东文史資料》第十三輯发表了罗翼群先生关于唐紹仪的史料，讀后觉得有补充訂正之必要，茲就見聞所及，写成草稿，以供参考。

幼学时期的唐紹仪

唐紹仪出生于广东香山（中山）县唐家湾，是經办上海輪船招商局及創辦唐山矿务路务的唐廷枢（景星）的族侄。唐的老一辈乡亲于1860年前后，即在上海为工商业占有者及洋行买办。因之唐紹仪很早就有向上爬的可能，得到提携的便利。

唐在1874年，十二岁时就被选为清廷遣送第三批的留美学生。同批三十人，除唐紹仪外，还有鄺景扬，鄺賢儔，郑延襄，卢祖华，薛有福，曹家祥，曹家爵，曹茂祥，康庚齡，孙广明，唐致尧，黃季良，楊兆南，楊昌齡，宦維城，袁长坤，徐振鵬，徐芝煊，吳敬荣，程大业，祁祖彝，梁如浩，容耀垣（星桥），周长齡（寿臣），周万鵬，林沛泉，沈家树，朱錫綬及朱宝奎。

他們年齡最大的只有十四歲，為周壽臣和孫廣明，而最小的僅十歲，為容星橋、宦維城和朱錫綬，其餘都是十二三歲。鄭其照（廣東南海縣人）任留學事務所（駐洋肄業局）的職員，帶領他們從上海到美東之“春田”。依照第一，第二（及其後第四批）的處理步驟，他們分派在“春田”及其他新英倫的市鄉，三三兩兩，住在小資產階級的少數人家，補習英語、英文、算術、文化等。經過一兩年，按學業成就的程度，先後分別插入小學。唐紹儀和梁如浩派於留學事務所所在的名市“哈富”的一家知識分子家中，主婦是小學教師。於是唐、梁兩人，由小學而中學，升進大學。唐紹儀考入哥倫比亞大學文科，未及升班即隨絕大多數的留學同伴束裝回國。他並非“堅決留美以自費或半工讀卒其所業”。

唐紹儀成為一個留學生，僅是比較善於交際，無甚特長。在智育方面，他遠不如詹天佑、陳鉅鏞、鄭廷襄，在體育方面，也不如梁敦彥、蔡紹基、鍾文耀，而在德育方面，更不如容揆、梁誠（丕旭、振東）、劉玉麟。（有說詹天佑及周壽臣亦在留美之列，以自費或半工讀卒其所業，則非事實。詹天佑是第一批的學生，在1881年，清廷召回之時，他恰巧從耶魯大學科學院畢業於土木工程專科。周壽臣一生好逸惡勞，善於與人共處，出身寒家，無從自費，亦未曾從事半工讀，清廷崩潰後，他更緊密地親近英帝國主義，而為殖民地香港政府服務了五十多年。）

練習時期的唐紹儀

我國當時留學美東的學生，全數一百二十人。不肯奉召，留而繼學，及因故已先被開除者共十一人，未歸先死則有三人，歸而立即隱居及自營業務者共十二人。1881年（光

緒七年)夏間，留美學生分作三批回到上海，困在南門一個舊房子里，共九十四人。除少數外，他們並無親友，坐臥無席，衣食無着。有徐潤(號雨之)者，中山縣人，按各申請，貸予大洋三十至五十元。唐紹儀因有親可靠，離開同學，丰衣足食；而且游玩探親，不久結婚成家了。

在津滬間，官府商洽如何處理這班青年。直督李鴻章奏准將九十四名歸國留學生分批分派“學習”。派到上海及其近地電報局的有二十一人，到上海機器局的有二十三人，到天津的水師、機器、魚雷、水雷、電報、醫館等處的共為五十人，唐紹儀是五十人之一。五十人合原有練習生共為一百二十三人，分類分班，都承李鴻章的重視。各班的“教習”是選聘的中國人和保薦的德國人及英國人。經過四年之後，在1885年(光緒十一年)春，舉行“臨時考核”，按成績差別分捐班、文童、武士的三類，照章請獎提升。特別蒙加獎者，總共數人而已，蔡廷干是其中之一，而唐紹儀無與焉。唐紹儀在文童之列，“以從九品，不論雙單月選用”。次日“經吏部照章核准註冊”。四年之間，未聞唐紹儀有何“獨特之足征”。同時，新疆伊犁問題及中法戰爭形勢，人們都有所傳告，然而文童唐紹儀等四十餘人，不審時事，不論政治，默默無聞。周壽臣是其中之一。後來在香港經商，自我解嘲，總以為“舊習慣固如是也，至今不宜責備”云。

官僚時期的唐紹儀

唐紹儀以從九品銜在天津進了稅務系統衙門，開始工作。適逢朝鮮王朝請設稅務署，而直隸總督兼職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通商事務大臣李鴻章奏准派天津稅務司德人穆麟德前往任總稅務司。穆氏選舉唐紹儀、梁如浩、蔡紹

基、周寿臣等赴任帮办税务事宜。1890年，唐紹仪轉任中国駐朝鮮商务委員事务所代理所长。1895年冬，他仍从袁世凱，轉任天津练兵小站洋务局局长。

1901年，唐以道員身分，在山东济南任新設的商务总局总办，而于年終轉任津海关道。1904年秋至1905年冬，以副都統銜，加三品京堂，派为議訂藏約全权大臣，以訂約未成，从印度經香港回抵北京。旋又奉命任外务部右侍郎兼督办京汉、沪宁鐵路大臣。次年春，他兼任鐵路总公司督办，不久即奏請裁撤了总公司而将公司所有事务归并商部办理。同时，他与英国駐京公使薩道义續商藏印条約，訂成六款，英国明认中国对于西藏有完全主权。有識之士不以所訂之約为滿意，一些日报社論稍有批評。是时清廷設稅务处，以戶部尙书鉄良为督办稅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唐紹仪为会办大臣，从而指揮总稅务司，确定稅务上下官制。年終，清廷以张百熙为邮传部尙书，唐紹仪为左侍郎仍兼外务部右侍郎。1907年春，出任奉天巡撫。1908年秋，又任专使出洋致謝美国定額拨还庚子賠款，并拟赴东西洋各国調查財政。但到了美京华盛顿一两月，适慈禧西太后及光緒皇帝相继急逝，即赶回北京。1910年夏，他改署邮传部尙书，經過五个月，称病乞休。次年秋，他又奉命为邮传大臣。至十月中旬，武汉南北軍停战，唐任清廷內閣全权代表与南方民軍代表伍廷芳議和。可是当时內閣总理大臣袁世凱立意操纵政权，迫他辞职，他即返京。

唐紹仪从新任津海关道开始，时約四十岁，一直至議和代表，历十年多，可謂官运亨通。在此时期，他自己重用翰林梁士詒，而又特別介紹他于袁世凱，先任为北洋編书局总办；三十余年間，梁士詒（燕孙）成为祸国殃民的罪魁之一

(以“財神”著名)。其次，唐紹儀引用了同学周寿臣、梁如浩、蔡紹基、蔡廷干、鍾文耀等人及侄婿施肇基，并介紹他們于袁世凱，都升了官发了財。专事出使、在美京华盛顿之时，唐紹儀以“厚礼”招待过优秀的留美学生数十人，嘱他們在国外要爭体面，而在国内要爭各方面的高官大权。在十年之間，他取得了高官大权，到处手段“豪迈”，但对国家毫无裨益。

辛亥以后的唐紹儀

辛亥革命时，唐紹儀以清廷議和代表身份。在武汉住了十余日，才和文案杨士琦到上海，又住了十余日，才开始在当时英租界工部局大楼参加議和。會議多次，詳报內閣总理袁世凱。沿途及閑中观听，唐紹儀有所感动，认为滿清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于是他后来重返北京就背叛清廷，与伍廷芳并駕齐驅，愿意为民国担任职务。

袁世凱就总統职后，即任唐紹儀为国务总理。1912年，即民国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国务院成立，因唐不愿完全充当袁的走狗，对袁不是百依百順，为袁不滿；而且国务院成立之次日又成立了总統府秘书厅及軍事处，袁唐之間因职权关系时有糾葛，形成府院对峙之局面。六月十六日唐紹儀辞总理职，避往天津。后又轉回上海租界寄居。1915年秋政学系一班人为了进行政治活动，在上海筹办《中华新报》，他表示贊同，即为发起人及贊助人，后来出版报纸，他却不常过問。1917年八月，护法軍政府在广州成立，唐紹儀被举为財政总长。次年軍政府改組，唐被举为七总裁之一，但他随孙中山先生居留上海，并未就职。

1919年二月，南北議和，北方以朱启鈴为总代表（后

改为王揖唐），南方則以唐紹仪为总代表，會議在上海举行。南方坚持北方即須停止向陝西福建进軍和任何参战（名为善后）借款，及取銷参战（名为边防）軍隊。和議于三月上旬无形中止。虽然會議于四月續开，但因国会的問題爭执，即于五月中旬破裂了。十月四日，南方总代表唐紹仪辞职。

1916年六月底，大總統黎元洪特任唐紹仪为外交总长，至九月底又准他辞职。1922年六月十一日大總統黎元洪由津回京复职，八月五日特任唐紹仪（继顏惠庆）署国务总理，至九月十九日免职。当时在上海及广州的人們认为：“無論就职与否，少川和那样的北京一群人，究竟能有什么作用？”及后，人們又說：“識得安福將領如豺狼当道，少川两次都未有到任。”唐不是不想在北京政府做官，实际上，因为段祺瑞反对，而有所顾虑。

1921年五月，孙中山就非常任唐紹仪于广州，特任唐紹仪为財政部长，他留在上海，未赴任（廖仲愷以次长兼署部长）。1922年六月，陈炯明叛变，叶举等部队围攻總統府，大總統孙中山脱險，孙夫人率卫士抗击突围。1924年二月，中国国民党改組，开始实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表了宣言，总理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黃埔軍校成立，工农运动从广州推展，一系列的工作引起革命形势大大变化，揭示了革命胜利的光明前途。但唐紹仪于这三四年間，无任何言行表白思想。他的曖昧和反抗潮流的态度，正可說明他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毫无兴趣的。

后来，他投靠新軍閥蔣介石、陈济棠。由长江而珠江，再由唐家湾而南京，輾轉爭权夺利。抗日战争一年后，他又在上海暗与溫宗尧等敗类勾結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借此取

蔣介石而代之，因而為蔣所忌，卒被杀害。這也可說明唐紹儀的大官僚大資產階級的本質。

唐紹儀的私生活

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經常教導大家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好好進行革命，號召人人勉力調查、研究、學習。他自己所提倡的政治主張、革命方略、知行學說、實業計劃等，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唐紹儀既是一個國民黨要人，但在辛亥以後，二十餘年，絲毫沒有響應孫先生的號召，他的興趣不在政府的什麼實際工作，只在於所謂“聲色貨利”。舉例而言，在他的家裡所藏，如當時在上海發行的《建設》雜誌或者重刊的《民報》等，親友們是見不到的，但真假古董及古今字畫倒有不少。於是有人謂“少川亦玩物喪志之流也”。

唐是留美學子的無名領袖，國務總理解職後，不時老少兩輩的同學都有些叙會，席上席外的人請他指教，但從未聞他發揮過一些帶有進步性的言論以及新政見解。特別是在抗日戰爭開始時，其間社會變化，世界動態，小者顯隱不定，大者鮮明突出。留在上海，如羅先生所述，唐紹儀是“德高望重”之鄉長。除了對於一些問題，有幾次附名發過通電外，他自己沒有提過任何偉論。以“鄉紳”的資格，對於遠近環境要事，他未曾有何行動足為“鄉人”的標榜。

唐紹儀充滿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素不以賢人自居，也不以什麼賢士為法。當初出仕在朝鮮為小吏，即納了“高麗美女”為妾。其後，飲食豐美，陳設超凡，招待奢華，取利藏貨，比上雖不如袁世凱，比下又不及梁燕孫，然而“取藏”之好，除衣服外，實在“超凡、豐美。”至老未改，同鄉共知，莫能為諱。不少深懷正義的同鄉人，更以他的這些不正

当的旧习为耻。罗先生历引叶遐翁的陈言不啻为他涂脂抹粉。

唐紹仪习于贪污浪费，享乐交游。无论有无官位，他都欢迎不少政客来访。1914年新春，在上海一些“乡里”闲居政客，欲转入工商界谋利，但皆以无资可投为难。适是时保险公司在上海商业中是引人注意的新排场。欧阳荣之和卢信（信公）都是唐紹仪的乡亲，目睹洋商加拿大的永明人寿保险公司生意兴隆，而我国人自己初办的华安合群保寿公司更显然是无本生利，一致认为这种商业大家可办，亦应该办到。唐紹仪当然极力赞成。不久，诸位政客组织了“金星人寿保险公司”，即推定某某政客和亲友为董事，而以唐紹仪为总董，荣之为常务董事，信公为总经理。实际经营业务是经理刘伯材和协理曾望雄。公司设在上海香港路角，为往来南北四川路必经之地。既然门面大、招徕繁，公司开支不免多于所预算；入不敷出，谈不上利润。董事遇有急需，又即向公司账房借支以应。1919年八月，公司宣告破产。护法议和，南北会谈所需费用，南方所担负的是由总裁伍廷芳按时汇支，而由总代表唐紹仪批付，实与“金星”无关。

唐紹仪与容闳

容闳是中山县南屏人，南屏乡离唐家湾不远。容闳是唐紹仪的族叔唐廷枢在玛礼逊学校的同学。唐紹仪被清廷选送到美国留学，与容闳是有关系的。

容闳要我国青年同他一样，而且远胜于他，能身受“西方文明”的“益处”和“西方教育”的培养，建议挑选比较贫寒的幼童，资送美国留学十至十五年，从小学至大学毕业，学有专长，经过实习，然后回国分配各方面为国服务，图强致

富。留学以五年为一期，每期积累学生一百五十至二百人，于头一期試办成功了，又选送多少幼童前往西欧留学，人数逐期继增。1860年前后，丁日昌和其他相識者为曾国藩在安庆的幕宾，都贊許容闳的想法，尤其是李鴻章。几經討論筹划，至1870年，丁日昌于天津會議教案后，乘机向曾国藩、李鴻章力陈容闳所議；但至1871年終，所商派遣幼童留学美国的办法才获奏准。

1872年資遣留学的办法实行，曾国藩已逝世，指导留学事务者实为李鴻章。李从丁日昌的提議(容闳同意后)，即以翰林陈兰彬和学士容闳为駐洋肄业局(正副)总办(又称委員，后称監督)。容建議分权办理留美事务，即以陈負責督理會計及管教中文，而他自己負責督理其他事务和进学教务。陈虽表明同意，然实在殊不服气。在进行办理过程中，容于实际上，通过仿效西学的言行，力主对祖国的礼教、文化及教育加以改革，而陈則图反对。所謂“跪拜”和“鞭笞”及其他封建的陋习不久免除。至于“毆打監督事件”，始終未曾发生。继陈为留学生監督之欧谔良、容增祥、吳嘉善(子登)，都是陈所推荐，而吳对于容闳，成見疾視，比陈更甚。陈吳两人向清廷有关方面攻击留美事务，推波助瀾，以謀停办这一新学計劃，急迫如犬豕，但并无“奏請……另行选送”之言。三年任期将滿，忍不了孤单生活，吳欲及早回国，亲謀“高升”，絕對不允久留，遵依李鴻章所示，以俟全体学生毕业于大学专科。李鴻章批准了陈的及吳的函电。先是，李着陈兰彬公使选送一些学生分进美国海陆两軍官大学，陈进行失当，未获分进；一方面陈借此攻击容闳，另一方面，李对于美国政府違約，即有不滿之处。同时，李自己已另有“教育計劃”，正在开始选送成年学生留学英德两国，向軍事专科肄业。

“美政府下……禁止华工之令”与我国留学事务只有一点的关涉，即准否我国学生进入美国军官大学肄业，引起糾紛。

唐紹仪于 1908 年，在美东未往見容閔；容的两个儿子从耶魯大学毕业归国，分謀出路极之为难，紹仪历二三十年未曾对他們一加援助。至于通緝令，紹仪在当大权时，也未为之設法取銷。

唐紹仪与袁世凱

1885年底，某夕駐朝鮮总稅务司穆麟德在汉城召开會議应付日本帝国主义者干預朝鮮王朝的党爭，特令稅务司唐紹仪守卫門口。练軍督办袁世凱依約赴会，騎馬臨門，紹仪提枪止之。袁問情由，談后而入，內心贊賞紹仪的机警。后来袁承命以道員，賞加三品銜，继陈树棠为中国駐朝鮮通商大臣，請准調紹仪于部下为領事官。从此袁唐結交共处，一直至1912年夏間。1894年日本为朝鮮內廷紛爭而借端发生战祸。袁唐和其他中国官員及一些华侨首脑冲出围困回国，各人自卫互助，袁感唐的近卫。有生一世，唐也深感袁对他的提拔和保荐。

然而袁唐两人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大不相同。唐有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趋向，袁守东方封建主义的思想。辛亥革命全国政治形势大变，袁不可能随之走向民主，而唐則适应之。袁視两人的关系，仍以主仆相待。当时梁士詒見及之，力奉袁氏所好，所以力拒孙中山而謀抗国民党。唐紹仪再不以袁氏所視為然，开始接近孙中山而加入国民党。袁唐政見不同，加以袁的左右朋僚，从中作恶，向唐攻击，两人友誼且无从保全，再談不上以誠相待，或者合作。任用王芝祥督直的問題引起疑难，不过分歧敌对的表面化而已。

唐紹儀在訪美期間（1908年）曾招待留美學生，特別賞識的一個肄業于哥倫比亞大學、將近“成材”、爭取博士頭銜的顧維鈞。同時，顧亦對唐愛戴備至，力陳近代中國外交成敗如何。即時，成為唐的第三女婿，顧以“少川”自號。領了博士論文獎費，1912年元旦後，顧少川到北京，唐即介紹于袁世凱任為英文秘書兼在外交部工作。袁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顧介紹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古德諾為總統府高等顧問。古德諾公開演講中國不宜建立共和，而以君主立憲為當，響開帝制的鑼鼓。回到美國（升任約翰合乾大學校長），古德諾更極力贊揚袁世凱之為人。令人驚訝的是唐紹儀始終沒有責備顧少川，也沒有質問教授古德諾的荒謬。其後，戰亂遍于全國，人民叫苦連天，唐紹儀坐視若無所見也者，未曾自動反對北洋軍閥，也未曾跟着孫中山前進。

唐紹儀與孫中山

孫、唐兩人是鄉親。翠亨村與唐家灣相近。彼此鄉人常有往來。中山先生出生于貧苦農家，紹儀出生于富裕商家。年紀不相上下。自幼小至壯，前者半工半讀而成長，後者正規學校升學而“成長”，前者幼年就不滿于當時的社會，思有以改造之，矢志革命，勤勞儉朴，努力前進。後者自覺自學都屬疏淺，無意革故圖新，而陶醉于“富貴榮華”、“安生樂命”。

兩人相識于1911—1912年。孫、唐和伍廷芳三人交誼非淺。從1912年夏，唐紹儀退居上海，至1913年夏，孫中山反袁失敗，出遊國外，三人相遇至再。1916年夏，袁死，至1920年冬，粵軍由閩节节勝利，回集廣州，孫、唐會談多次，有所商議，大都中山先生為主動。在1920年之後，兩人無何叙會。

在家里，中山先生与紹仪会晤，間或强留共膳，飲食簡單菲薄。中山时言我国非富强則不足以图存，非革命則不可以求富强，非建設則不能保証革命胜利，非力图团结統一，无从建設，非好学多能，无以战胜艰难困苦。紹仪听了表示佩服；但其后未聞他有何实践，对中山有何同心同德。

中山先生屡言同事之間，永远应以誠相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互相劝勉，不断努力。信服利用，择善而从。崇拜奴役都貽害无穷”。有时說明“知难行易”的事实，有时纵論“群策群力”、“天下为公”的道理。紹仪似不耐煩，当时及过后，未見有何筆記。中山与世长辞了，也未聞紹仪有何忆談。紹仪对于中山力求中国富强之旨，抱有希望，間或对一些老人述之；但对于所倡“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則无信心。至于中山先生所議“調查，研究，学习，批評英法美的政治历史，經濟成果、軍事經驗，文教进程”，紹仪每每以年老，久不习于學問，推諉“未能追随”。

中山先生对于苏联十月革命，感动过人；一面領導并亲自加入护法战争，一面查詢“俄国革命”的进行情况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1918年秋，他回到上海之后，頻告我們一些同志：“列宁有知識、有办法、有能力、有思想，領導俄人如何革命，創开一个前所未聞的新局面，一定成功”。1919年有一次，唐紹仪到香山（莫利爱）路孙寓共談，中山先生以俄国革命特問唐紹仪所聞，他无可告。先生笑謂：“如果我們能够再生，真是青年，不会向西欧北美留学，反而要往东欧俄国就速成科学习，会見列宁，听听演讲。……現在我們革命黨員应即往俄肄业”。他插言：“俄語难学，俄人难交……”先生即言：“未有听过我国前人所說么？‘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中山先生以唐紹儀在1900年至1911年之間，曾任高职，都是关于主办通商、財政、交通的发展事情，劝他参佐筹定“实业計劃”，并且多次令《建設》杂志編輯林云陔向他征求述作，他都一概“謙遜”推辞。不只一次，中山先生着“民智书局”經理林煥廷向他請求协助巩固和扩张书局业务，他总以“穷且老”而謝絕。

唐紹儀虽然号称国民党要人、屡蒙尊重、担任了要职，但根本不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他不仅无真心服从中山先生的主张，而且也无决心追随中山先生。如1923年之后，有时他强调对我们一些人言：“孙总理确是革命家、政治家，而且可称軍事家；但理想过高，理論太广，不大切于实际。我有內心的敬仰，但无攀援的可能呵！”